

史通

与先唐典籍

马铁浩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晋汉世诸儒，集论经传，定之于白虎阁，因名曰《白虎通》。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，故便以《史通》为目。封为史通子，是知史之称通，其来自久。博采众议，爰定兹名。凡为甘卷，列之如左，合若干言。于时岁次

史通 与先唐典籍

马铁浩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惠 pphLh@126.com

封面设计:刘文君

版式设计:雅思雅特

责任校对:史 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史通》与先唐典籍/马铁浩 著.

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0.12

ISBN 978-7-01-009522-6

I. ①史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史学理论—中国—唐代 IV. ①
K092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0028 号

《史通》与先唐典籍

SHITONG YU XIANTANG DIANJI

马铁浩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5

字数:372 千字 印数:0,001-2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09522-6 定价:35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序

《文心雕龙》和《史通》是我非常喜欢的两部经典著作。这里暂且不论其理论贡献，就文献价值而言，两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评述了很多著作，自然也论及了作者。从目前所保留下来的著作看，他们的评论大都准确犀利，多为不移之论。刘师培在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：“历代文章得失，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。”这个道理不言而喻，汉魏六朝之文，后代多有散佚，我们所能看到的远远不如当时人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仅就刘勰、刘知幾而言，“二刘”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，阅读范围非常宽泛，且思考深入。他们的见识，他们的评论，我们自应格外珍重。刘师培所谓“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”，这论断不无道理。

具体落实到《史通》，作者刘知幾持有什么样的观念来选择和评述历代著作？这些著作在后世的流传情况又如何？而这，正是马铁浩的新著《〈史通〉与先唐典籍》着重关注的问题。

现代史学研究有“史料学派”与“史观学派”的区分，前者通过对资料的搜集、整理、考订、辨伪，力求获得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；后者则以系统的观点通释历史的发展，从而探讨历史规律与史学演进之观念。

据我所知,《〈史通〉与先唐典籍》原本分内外两编。内编即本书主体《〈史通〉与先唐典籍》,重点讨论的是刘知幾的历史观,这里包括:1. 刘知幾的四部之学,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(文学)四个方面;2. 以史论经与以经论史,从这两个角度论述刘知幾出入经史的缘故;3. 编年体兴衰的政治意蕴与学术基础,认为刘知幾标举纪传、编年二体,以编年体入正史,源于对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编年体史籍的推崇;4. 初唐史学中正史与霸史的确立,将《史通》对唐初诸史的批评置于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解释,从而揭示出刘知幾正统观念的矛盾;5. 正史视野中的“杂述”,从《史通》对“杂述”的批评中,烛照出刘知幾的儒学史家本色;6. 刘知幾的天人之学,通过对《书志》、《汉书五行志错误》、《五行志杂驳》等篇的辨析,揭示儒学史家探索天人之际时表现出的伦理和政治特征。通过这些考察,希望能够为刘知幾史学理论研究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创意的解释。

外编为《〈史通〉引书考》,根据《史通》所评述的典籍,统计出来大约有三百四十种。作者按照传统目录学的方法,逐一考察这些典籍的书名、作者、卷帙、存佚、注释及影响等方面,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,做到胸中有数。这是全部论文的文献基础。这样处理,希望在确定性历史知识的探求上亦能有新的发现。

由此来看,全书内外编的结构关联是比较密切的。内编所谓的“史观”主要是史籍观,亦即刘知幾的文献观;外编“史料”考辨的目的则是探索典籍原貌,从而使刘知幾史籍批评的学术特征呈现出来。这样的安排,结构比较稳妥,文献与理论并重,注重揭示问题的来龙去脉。从文献学出发,不集中探讨史学理论问题,但也不回避史学理论问题。《史通》中评述的典籍,大约有三百四十种,书稿逐条考证这些典籍,典籍的存佚流传,刘知幾针对典籍提出的问题,以及刘知幾史籍批评中的矛盾之处,都是作者要着力

解决的。遗憾的是,由于篇幅的限制,《〈史通〉与先唐典籍》只收录了理论阐释的内编,而外编《〈史通〉引书考》则未能收录。我希望将来有机会,这部分内容也能结集面世,以求证于学术界的同仁。

五年前,马铁浩参加博士学位入学考试,他的专业课试卷,漂亮的繁体字,工工整整;答题也要言不烦,面面俱到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我知道,他的硕士论文以唐代典籍考订为主,对于唐代及唐前典籍比较熟悉,就商量以《史通》的文献学研究为对象。从那时起,马铁浩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上,潜心研读相关典籍,尤其注重目录学的探讨。为此,他首先收集整理出详尽的《史通》研究论文论著目录,撰写了研究综述;又花费一年多的时间,编写近百万字的《〈史通〉引书考资料长编》,认真阅读钻研《史通》评论所及的主要典籍,对《史通》征引评述的三百四十余种典籍进行详细考证。在资料长编基础上,他写出了《〈史通〉引书考》70余条。这些基础性的文献工作,为他撰写《〈史通〉与先唐典籍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也是这部著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。

文献考订与理论探索并重,因枝振叶,沿波讨源,就使得他的著作别具风范。与单纯的史学史研究相比,《〈史通〉与先唐典籍》具有文献学特有的精深与缜密,同时又跳出了文献学研究常常见树不见林的局限。他能从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,从细微处探索刘知幾与先唐学术的关系,避免了现有《史通》研究就理论谈理论的通病,对于认识儒学传统中的古代史学很有意义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,作者每立一说,皆本着无征不信的原则,原原本本,实事求是,凡引原文和他人成果,必标明出处,且注页码,对此,我特别欣

序

赏。不论论文做得怎样,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

人民出版社在读书出版界享有盛誉。能够在那里出版著作,是很多年轻学者的梦想。作为导师,我知道马铁浩为撰写这部著

《史通》与先唐典籍

作所下的工夫,也深知作者的为人和治学,用勤勉细密四字概括,似不为过。我相信,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对作者有益,对广大读者也有莫大的学术参考价值。

刘跃进

2010 年岁末草于京城爱吾庐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/ 1

导论:儒家史学的知识形态 / 1

第一章 刘知幾的四部之学 25

第一节 刘知幾与初唐经学 / 26

一、《史通》对《经典释文》的因袭 / 28

二、《五经正义》对《史通》的影响 / 35

三、刘知幾与司马贞的经学论争 / 38

第二节 《史通》的史籍流别观 / 44

一、《史通》对《隋志》的批评 / 44

二、《史通》、《隋志》史籍流别观的性质之异 / 46

三、以“六家二体”为范型的“古今正史” / 47

四、“六家二体”之外的“杂述” / 54

第三节 作为子书的《史通》 / 59

一、《自叙》篇自述学术渊源 / 59

二、儒家、法家抑或杂家 / 65

三、《史通》内外篇之关系 / 71

第四节 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 / 74

一、从“文之将史，其流一焉”到“文之与史，较然异辙” / 75

二、从贞观到开元：史家在文学时代 / 77

三、以文衡史与以史律文 / 84

第二章 以史论经与以经论史 90

第一节 《疑古》篇接受史与古今学术变迁 / 92

一、信古时代 / 94

二、疑古时代 / 103

三、释古时代 / 112

第二节 以史论《春秋》与古文经学 / 116

一、《惑经》篇以史论《春秋》多本杜预 / 117

二、《左传》以史传经对《史通》以史论经的影响 / 122

第三节 以“例”论史及其学术渊源 / 127

一、刘知幾以“例”论《春秋》 / 127

二、《春秋》学家以“例”论经对刘知幾的影响 / 132

三、变经例为史例：刘知幾以“例”论史举隅 / 137

第三章 编年体兴衰的政治意蕴与学术基础 150

第一节 编年体兴衰与政治之关系 / 151

一、荀悦《汉纪》的尊汉意识 / 152

二、尊晋意识的逐渐形成 / 154

三、桓温专权时期的编年史撰述 / 158

四、编年史中的梁末之乱 / 163

五、编年史的盛行与北魏国史之狱的发生 / 169

六、北齐史统纪问题的变迁 / 173

第二节 《竹书纪年》的意义 / 178

一、《竹书纪年》“多与《春秋》、《左氏》扶同” / 178

二、《史通》征引《竹书纪年》考论 / 181

第四章 初唐史学中正史与霸史的确立 191

第一节 伪史、霸史、载记 / 192

一、《七录》之“伪史” / 192

二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之“霸史” / 194

三、《晋书》之“载记” / 196

第二节 十六国史的正伪问题 / 199

一、十六国政权自立正朔 / 199

二、《隋志》、《史通》著录十六国史之比较 / 201

三、《十六国春秋》与《三十国春秋》的正统观 / 205

四、前凉、西凉不入《晋书·载记》 / 214

第三节 南北朝史的正伪问题 / 219

一、南北对峙时期南北史籍互称“索虏”与“岛夷” / 221

二、南北统一后“索虏”、“岛夷”之史皆成正史 / 226

第四节 刘知幾以霸史为正史? / 241

一、刘知幾以霸史为正史? / 241

二、刘知幾正统观的产生 / 244

三、刘知幾之矛盾根源于正统论自身之矛盾 / 248

第五章 正史视野中的“杂述” 250

第一节 杂传与列传 / 254

一、别传 / 255

二、郡书 / 259

三、家史 / 264

四、杂记 / 267

第二节 小说与正史 / 270

一、琐言 / 270

二、逸事 / 276

三、杂记 / 282

第三节 地理书与地理志 / 287

一、地理书 / 288

二、都邑簿 / 297

第六章 刘知幾的天人之学 301

第一节 刘知幾对阴阳灾异的态度 / 302

一、《书志》篇论天人感应之条件 / 304

二、《错误》、《杂驳》篇释天人感应 / 307

三、刘知幾论《五行志》的《左传》学背景 / 312

第二节 刘知幾论《五行志》的方法 / 317

一、以引书论 / 318

二、以叙事论 / 322

三、以解释论 / 326

四、以时间论 / 331

结 语 / 338

附录一 《史通》引书目录 / 343

附录二 《史通》研究论文论著目录 / 408

参考文献 / 456

后 记 / 467

导论：儒家史学的知识形态

一

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,《史通》的影响并不甚大。唐宋时期,虽然有学者对其侮圣非经的态度提出批评,但并未产生深远影响。明代陆深刊刻《史通》,李维桢、郭孔延、王惟俭等亦纷纷为之作注,带动了《史通》学的兴起。清代学者延续了这一热情,在《史通》的校勘、注释、评论上,都做出了一些成绩。但整体而言,对《史通》的关注在经学时代一直处于边缘,这与刘知幾的疑古、惑经大有关系。

直至二十世纪经学进入历史之后,《史通》才真正走到了黄金时代。旧时代之经典,随着四部之学的终结,弥散了千百年来经学家附丽其上的神圣光芒,成为平实客观的上古史迹。由此,刘知幾也从经典褻读者一变而为现代史学的思想先驱。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,中国史家努力确立中国史学之地位,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建立起来,刘知幾《史通》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。从此,对《史通》的研究逐渐摆脱了传统经史之学的框

架,基本上都在中国史学史这一平台上展开。

追寻二十世纪《史通》流传的历史,可以发现,有几股学术思潮对《史通》研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其一,世纪之初梁启超倡导的史界革命;^①其二,二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的兴起;其三,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;其四,七十年代中叶的评法批儒运动;其五,八十年代的文化热。这些思潮渊源不同,性质有异,但对《史通》研究的影响基本上朝着一个方向,即对《史通》批判思想、进步思想的揭示。这一趋向巩固了刘知幾作为批判史家的历史地位。

九十年代以后,学术史研究逐渐成为古典研究的主流,大家开始以回归传统作为号召,摆脱西学的影响,回到四部之学本身。现在重新检视《史通》中的思想矛盾,不难发现刘知幾的史学观其实相当保守,在疑古、惑经的背后,刘知幾与儒家正统史学具有深切的联系。所谓的“国学复兴”使人们重新把颂赞赋予孔子,但他对当代文化塑造基本上不再产生影响,真正的儒学已经成为历史,犹如列文森所言,孔子只是“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品”^②。和孔子一起,那些历史上孔子的批判者和孔子一起走进了博物馆。他们彼此之间,不再有敌意,安安静静,被塑像,被皮藏,共同接受后来者的膜拜与尊崇。具体到批判史家刘知幾,二十世纪前期的疑古之风,为现代历史学家肯定刘知幾的疑古、惑经提供了土壤,但他的批判色彩又迅速被弱化——即便在评法批儒时期,刘氏被视

① 这里所谓“史界革命”乃泛指。梁启超1901年始倡史界革命,次年发表《新史学》,皆未言刘知幾;梁启超首次提及刘知幾,是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中(该文始作于1902年),后来著述对刘知幾多有推重,将其与郑樵、章学诚并称,奠定了《史通》研究的新格局。参见许冠三:《刘知幾的实录史学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,第222—226页。

② [美]约瑟夫·列文森: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,郑大华、任菁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320页。

为法家——因为他所疑之古、所惑之经，早已成为历史。刘知幾的刀枪剑戟如今面对的只是一个无物之阵，他死掉了，孔子及其后的经学时代也死掉了，无论彼此多么有力，一切都成了过去时。孔子，孔子的批评者，都成了历史人物，各自呈现各自的历史意义，互不干涉，仅此而已。九十年代以前对《史通》批判性的重视，在如今的学术视野中，逐渐消弭于无形。那么，在思想淡出、学术凸显的时代，如何重新认识刘知幾？这一问题构成了本文的思想起点。

本文通过对《史通》征引先唐典籍的考论，梳理刘知幾与先唐学术的关系，旨在探讨批判史家刘知幾的儒家正统史学渊源。刘知幾之史学是客观还是主观，是重实录还是扬名教，是疑古还是复古，是批判还是正统，其思想矛盾都将在学术史的视野中加以揭示。这些矛盾不仅是刘知幾史学固有的，也是九十年代以来学术风气变迁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的。此前对客观、实录、疑古、批判的肯定，如今逐渐让位于对主观、名教、复古、正统等传统方面的认识。正是因为这样的转变，本文对《史通》学术渊源、思想矛盾的探析，折射出儒家史学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联，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方法论反思的意义。二十世纪以来，对刘知幾思想中展现出的复杂性的认识，是学术风气推移带来的，而中国现代学术风气的推移，又始终离不开西方学术思潮的激荡。经史之学的传统已经断裂，现在研究中国学术史问题，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视野。这里要讨论的核心问题，即“儒家史学的知识形态”，本身就是西学视野下提出的理论命题，或者准确地说，是当代视野下提出的理论命题。

一
一

“儒家史学”是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指称，汪荣祖先生说：

西方学者泛称中国传统史学为“儒家史学”，就像他们视两千余年的帝制中国为儒教中国一样，因他们以儒家为哲学或宗教，以及视为一种意识形态，并预设前提，认为儒教乃笼罩帝制中国无所不在的精神面貌。……西方史家对所谓“儒家史学”的具体批评，不外认为主观的褒贬有违客观；御用史官替政治服务，失之真实；编抄史书无异剪贴簿，枯燥无趣。^①

在西方史家的印象中，中国传统史学是儒家的附庸，它以伦理为旨归，受孔子春秋大义的影响，追求使乱臣贼子惧的道德境界；它以政治为依傍，史官为君主制政府服务，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；它以收集编排史料为特色，缺乏综合与解释，缺乏独立的史学观念。其实，这些认识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传统史学的实际情形，“儒家史学”这个称谓，体现出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误解。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《太史公》（《史记》）、《汉著记》等纪传、编年体史籍附入六艺略之春秋家，史学确可视为儒家经学的附庸，但从历史发展来看，儒家经学产生之前，史学已经肇端；^②儒家经学产生之后，史学又逐渐

① 汪荣祖：《史学九章》之《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》，三联书店 2006 年版，第 89、91 页。

② 李零先生根据近年出土文献，认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前的史书很多，战国时代是否把史书置于六艺略之春秋家，完全没有证据。因此，他主张把史书独立出来，立为先秦典籍的专门一类。参见其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（修订本），三联书店 2008 年版。

走向独立，它并非一直与儒家经学纠结在一起。

中国传统学术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但从产生先后来看，其次序应该是史、子、经、集。史官文化是先秦诸子兴盛之前文化形态的典型代表。乾嘉时期，章学诚已经把儒家六经之学向前追溯到周代史官所藏之先王政典，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上》：“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^①至龚自珍，则更进一步，把经、子视为周史之大宗、小宗，《古史钩沉论二》：“六经者，周史之大宗也。……诸子也者，周史之支孽小宗也。”清末刘师培作《古学出于史官论》，详申龚氏之说，认为“六艺出于史”、“九流出于史”、“术数方技之学出于史”，“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，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”。^② 他们把“史”看作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，就先秦制度而言，这一看法是颇有根据的。钱穆先生说：

大抵先秦学官有二：一曰史官，一曰博士官。史官自商、周以来已有之，此乃贵族封建宗法时代王官之旧传，博士官则自战国始有，盖相应于平民社会自由学术之兴起。诸子百家既盛，乃始有博士官之创建。博士官与史官分立，即古者“王官学”与后世“百家言”对峙一象征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《六艺》与诸子分类，《六艺》即古学，其先掌于史官，诸子则今学，所谓“家人言”是也。^③

儒、道、墨、法等百家争鸣是官学下移的产物，在平民学术觉醒之

① 叶瑛：《文史通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页。

② 以上引文转引自许兆昌：《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》附论《史官文化的历史地位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47—350页。

③ 钱穆：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·两汉博士家法考》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，第186—187页。

前,史官之学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文化角色。从史学的起源来讲,它与儒家原本是无涉的。但自从孔子整理《春秋》,笔则笔,削则削,以书法行褒贬之效,史学便开始与儒家发生关联;当《春秋》成为六艺之一,史学也随之成为经学的附庸。

然而,这一格局很快便被打破,像《汉志·六艺略·春秋家》中的《太史公》,司马迁虽然以“继《春秋》”自命,但其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著述宗旨,以及“是非颇缪于圣人,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”(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)的思想倾向,已远非儒家所能拘囿的了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随着史部著作数目和品类的骤增,史学逐渐走向独立,慢慢摆脱了隶属于《春秋》经的附属地位,这从当时目录学的发展变化可以明显看出。西晋荀勖依据曹魏郑默《中经》撰《中经新簿》,分群书为四部,丙部有史记、旧事、皇览簿、杂事(丁部附有汲冢书),标志着史学从经学中摆脱出来,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;东晋李充改史记为乙部,确定了史学在四部之学中的第二位次;梁代阮孝绪编撰《七录》,第二类为纪传录,专门著录史籍,分国史、注历、旧事、职官、仪典、法制、伪史、杂传、鬼神、土地、谱状、簿录十二部;《隋书·经籍志》重新依荀勖、李充之例,将典籍分为四类,名之曰经史子集,其中史部分为正史、古史、杂史、霸史、起居注、旧事、职官、仪注、刑法、杂传、地理、谱系、簿录十三个门类,足以反映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繁荣之势。如此多样的史著形式,自然早已突破了《春秋》经学的藩篱,其思想格局也是复杂多元的,并不仅仅限于儒家之学。特别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开始在纪传体史籍中占有一席之地,如魏收《魏书·释老志》、慧皎《高僧传》,佛、道目录也开始产生,如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、陆修静《灵宝经目》,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,说明史学已经从儒家经学的笼罩下走了出来。

从上文对史学发展历程的梳理来看,西方史家所谓“儒家史